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



Issue No. **4** 2008

总第八期



2008年10月18日，我院召开“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二次编撰研讨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开始举办，此为葛兆光教授作第一场专题报告。



2008年11月25日，我院举办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的合作签约仪式。



“复旦文史讲堂”2007至2008年共计举办37场，成为复旦师生与海内外知名学者相互沟通的窗口。每场讲演的摘要及部分讲演视频，发布于我院网站 www.iahs.fudan.edu.cn。

目 录

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签署学术交流及合作研究协议	2
“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二次编撰研讨会纪要	3
文史研究院小型研讨会共议中外交流史学科发展	9
朱熹研究在美国：以陈荣捷、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	12
■田 浩 (Hoyt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15
■桑 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18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	
汉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	21
■陈庆浩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	
王东杰 声入心通：切音字运动与清季思想界塑造国民的努力	24
孙英刚 见鬼人与反魂香：中古巫覡文化的一个社会史考察	25
新书介绍：艾尔曼、包弼德、李孝悌、高桥智等	26
外刊撷英	29
博士后论坛：从《善邻国宝记》看日本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对华观	32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08.10—2008.12）	33

“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二次编撰研讨会纪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联合倡议编写的“研究生学术入门”系列丛书,自2007年9月启动以来,在首批编者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下顺利进展,将于2009年上半年出版第一批著作。为进一步推进这套丛书的编撰和出版工作,文史研究院于2008年10月18日召开了“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第二次编撰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互相交流《入门》编写的进展,围绕已编撰完成的张隆溪教授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展开讨论,对下一步编撰中的内容、体例等方面需要改进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推荐编撰《入门》的新领域与新人选。以下是本次会议纪要。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首先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会议。我知道大家都是忙人,各有各的事,聚起来不容易。今天开这个会,一是希望各位已经承担写作任务的作者加把劲儿,使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

拿出一批书来。二是希望几位还没有签约的作者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作为第二批作者。三是想借着已经成书的张隆溪教授大作,讨论一下这套丛书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体例上有哪些应该有所改进。

我们先请贺社长说几句。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首先向各位表示感谢。由葛教授倡议,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套“研究生学术入门”丛书,我们觉得是很好的。研究生



院、文科科研处也都对这个倡议有很大兴趣,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在,张隆溪教授这一本已经做出来了,的确是一本很好的给研究生的读物,希望这套书原先策划的诸多选题,都能够尽快落实。我们的想法是最迟明年

年上半年,至少有五、六种出版,或者更多,形成一定的规模,给整套图书的陆续出版打下基础。我们也希望更多优秀学者参与进来,把这套书做得更好,让研究生、本科生或者相关领域的青年教师都能够对这套书感兴趣。我们出版社今天来了很多同志,都是想通过这个会,了解如何把我们的编辑工作和服务工作做好。第一本书做出来是一个示范,我们觉得有满意的地方,但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我们注意,以后怎么做,也希望葛教授和各位老师给我们提要求。我们会努力配合



各位老师,使大家的成果能够尽快出来。

葛兆光:我再简单讲一下我的想法。据我所知,现在有几个大学出版社都在做一些类似的读物。比如北大出版社出了一些读本,像《中国史学史读本》、《历史理论读本》等等,北师大出版社也打算引进海外大学各学科的读本、导引等等。估计这是因为大家都已感到,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是有问题的。老实说,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水准是下降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不同学校、不同老师、不同学科落差非常大。教法不同,路数不同,有的走偏锋出奇兵,有的则是糊弄事儿。我们应该承认,有的地方条件有限,有些指导教师的水平和眼界也有限,他们对学界的趋势、前沿、问题不了解,如果这样,指导的学生就有问题。过去都认为,研究生阶段不需要教材,因为研究生是研究阶段了,不是绑手绑脚的阶段了。可是,我想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方法,这不一定是按部就班、规规矩矩的教材,而是一个作为参考的读本。过去有种说法叫“不把金针度与人”,现在我们倒是要“专把金针度与人”,不是交给他常识,而是交给他方法。我一直说,给大学生常识,给研究生方法,到了博士生就应该给视野。所以,我想我们这套书编出来还是有意义的。就我所知,其他地方有人也有这样计划,但他们没有想仔细,没有我们设想得周到。

今天,不少作者来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来讨论一下这套书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本张隆溪教授的《入门》,我先看过了,读了之后有几点感想。第一点,书的格局是堂堂正正的。做学问的确是有堂堂正正的路数和走偏锋出奇招的路数的差别,给研究生就是要给堂堂正正的路数。我过去学下围棋,总是按定式走,可能有人觉得你很呆,但是到高段的时候,你只有按定式走堂堂正正的路数,走野路子基本上是不行的。张隆溪这本书在学术史回顾和方法论介绍上,基本上挑选的是公认比较重要的学者和著作,在这个方面,要公正又要开放,还要站得稍微高一点,走堂堂正正的路子,教学生千万别总是想偏锋怪招。我觉得,做学问可以求异,但写这种书还是先守正,守正再变新,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张隆溪这本书叙述

非常简要清通。我们这套书分量有限,不能够长篇大论、啰里啰嗦地去讲,要尽量挑简明的叙述,这套书的定位是给硕士一年级的学生,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不可能接受特别复杂深奥的东西,当初定了十到十五万字的篇幅要求,所以叙述要简明,挑选要严格,不要把它变得太复杂。我觉得,思考不妨求深,但表达则要从浅,理论可以深刻,说话不一定要深奥。我比较佩服像周予同、朱光潜、胡适,尽管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他们写的东西都很明白。这本书在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第三点,我们在全书最后设立了一章书目部分。张隆溪教授做得很好,他选的都是很重要的论著,而且他在每本书下面还有简明的提示,但我稍稍不足的是,参考文献开得少了一些,我是希望除了有这些基本的入门书以外,再开一个“进阶论著目录”,可以不用写提要,但是可以让这个书目更丰富一点,这样,图书馆条件不太好的研究生也能够按图索骥。另外,陶飞亚教授早已经把他开的参考目录传给我了,我觉得他的论著目录在丰富性上做得很好,光是目录就有将近十万字,他做的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入门》,复杂程度非常大,书目有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他愿意把他知道的书尽量提供给刚刚入行的研究生。当然,他的书目也太长了一些,似乎可以删减一些,让读者知道哪些比较重要。在我看来,给刚刚入门的研究生以一个宽阔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参考文献。开什么样的参考文献常常反映出你的路数、你的视野和你的格局。我总觉得,做研究生老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必读和参考文献,如果能够把文献开出由浅入深的序列来,当然更高明。我看了张隆溪教授这本书以后,一方面觉得非常高兴,高兴的是他的书写得那么好,给大家一点压力;另一方面,因为这本书,使我们对这套书的期望又更高了一点。

总之,希望大家尽快把书写出来,因为这件事情,第一文史研究院、研究生院、文科科研处包括出版社都非常重视,第二这个形式目前国内还不太有,至少没有这样成系列的东西,我们需要把握先机。

康保成(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材需要的不是很深,



康保成

但是要准,不能有硬伤,误导学生。年初,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来了一封邀请函,邀请我去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给的任务很轻。我就把这本书带去写,不敢怠慢。我当初拟过一个提纲,可现在写的情况和当初的提纲差别很大,刚才来的路上就在拜读张隆溪教授这本书,看了之后有些感受。我自己写的和他有暗合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我写的偏深,回去还要做些修改。再说篇幅,这本书比我想象的要小,我看了后面字数是十二万二千字,我篇幅超出了不少,已经完成了十三四万字,还有两万字的目录。张先生这本书一开始引论“何为比较文学”,我是“何为戏剧史”,后面的总结也一样,中间部分由于是两个学科,所以相差比较大。张先生特别推崇钱钟书先生,我就特别推崇王国维,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个标杆。另外就是我和他整个写作风格也不一样。我估计按时交稿没有问题,内容上、格式上的问题,可能初稿完成后还要进一步修改。



詹鄞鑫(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我目前写的篇幅已经有二十八万字,排印出来可能要超过三十万了,因此要怎么删?这是我很头痛的事情。体例上还需要再调整一下,基本已经到收尾阶段了。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最近几十年下来,研究生、博士生研究成果很多,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不是单篇的小论文,他们从资历来讲比较浅,从成果质量讲也不太成熟,但是,他们研究的课题有些比较新,也代表了最近十来年学术研究的动向,所以不提也不行,但是如果提,就有一个评价的问题,这是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难点。第二,我是严格按照原来定的体例来的,第一部分是问题与回顾,问题提出来以后简单讲一下前人研究的状态,把争论的焦点做一些分析,是把学术史和专题讨论结合起来了。

第二个部分有一些个案研究,挑选了几家,比如裘锡圭讨论同形字的问题。大家中间挑了三四家,中青年中间也挑了几家。第三部分呢,我用的题目是“研究方法的几点体会”,我感觉,是我可以谈的问题我就谈几点,而不是很全面地来谈方法。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参考文献,初步数了一下,有二十八九页的样子,这个参考文献有一部分是这个领域必须读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正文里面引用了,所以列在后面。



钱杭

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我已经交稿了,现在是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修改意见,看看我的写法行不行。我是根据我认为宗族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几个相关问题写的。我认为,只要把这几个问题搞明白了,那么,整个过程就出来了。每一个问题中都包括案例,同时也包括理论、方法,可以单独成章。这样的写法行不行,是不是有一点太像讲座,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评价。我的书目部分跟张先生的差不多。我希望可以把参考书目写得具有可读性,而不是简单的开列。

有一部分是写摘要的形式,甚至对于一些外文书,我还把部分重要章节直接翻译出来,这样可以让读者直接参考和引用,而不仅是按图索骥。当然,后面也有一部分只是列出专著和论文目录。还有一点,可能是出于个人习惯,我喜欢做脚注,有的脚注做了半页、大半页,里面已经有很多关于各种相关文献的说明,由于篇幅有限,我不想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再来一遍,我就做一个回溯式的提要。我觉得参考书目的写法,要根据你这个学科的性质,学科各有不同,有一些是绝学,你这是第一本,或者是前五本,那么,这个时候你后面开出很厚的参考书目是可以的,比如像陶飞亚这种。但像我这种宗族史研究,是中国从有经学以来就非常成熟,并且逐渐积累了大量成果的一门学问,所以,我的想法是把问题梳理出来,没有必要把别人太熟的东西都编进书目,而是跟着问题走,有多少问题就开多少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书目。我觉得“入门”的关键是要划定一



定的范围,而不是写一本百科全书,所以,我对这套书的理解是“开拓眼界,严守范围”,严守这门学科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有所追求、有所扩展。



芮传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目前写作进度已经过半,体例严格按照四大部分做。开头跟张隆溪先生差不多,就是另外加了个题解,解释“丝绸之路”的概念。我的专业是古代中西交通史,但“古代中西交通

史入门”这个题目太大,我觉得用“丝绸之路研究入门”更好,也更容易理解。我把题目限定在近代以前,限定在陆路,而且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经过新疆的丝绸之路。这个题目其实仍然很大,包括许多内容,比如内陆欧亚一大块,中西交通一块,传统的丝绸之路一块,西域研究一块,和现在很热火的敦煌一块,因此,我必须有所侧重。事实上,丝绸之路从最早由德国学者提出到现在,经过很多年,国外研究成千上万,事实上比中国还要多,但很多书很难看到,所以我想还是应该以中国为主,国外的可以适当地介绍一下。另外想说的一点是,现在网络上有些资料很管用,我上过一个网站,包括一些著名外文书都有原文的扫描,我觉得这对学生来说很方便,因此我也介绍一些网络资源给学生。书我已经写了一半多,一个感觉就是,从内容上看基本就是在介绍书,因为介绍研究的历史要以书为例,谈方法也需要把书举出来,讲案例还是要提到书。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我很同意之前几位老师的意见,我们其实就是在介绍书,介绍典范性的例子。我写的是两宋道学。宋明理学太大,就集中在宋代,而且就是道学这一块。我现在基本上资料收集了两三万字,写法

还一直在斟酌。因为这本书可能需要打破纯哲学研究的路子。第一部分引言,然后从思想史的研究路子、哲学史的研究路子、学术史的研究路子、文化史的研究路子进入,针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这个学科张力很大,比方说研究两宋道学,牟宗三和余英时完全不同,都非常有特色,要把他们的特点和方法介绍出来,这就有一个如何选择材料、如何立论的问题。关于书目,我也同意应该分两部分,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书可以附点评,一部分做成进阶目录。



范荧(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我和严耀中老师合作,目前初稿都已经完成,也已经互相审读完。参加这个会议,是想看看各位专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让我们吸取。具体到我做的这本书,我觉得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第一块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讲,但回顾部分我们就很难讲,因为我们这一块分得很散,宗教这一块就有道教、佛教、基督教还有很多民间宗教,不大可能在一个章节中对宗教文献学做一个回顾。所以,我们章节的安排可能跟其他书有些区别。字数方面,目前统计已经有十四万多,排印出来至少十七万以上。至于参考书目,可能篇幅不会很大,因为虽然宗教方面的文献很多,但针对这些文献做研究的并不是很多。



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我已经做了百分之七十。这学期我正好在上这门课。与之前各位不同的是,我做的是传统学科,所以,综述性的文字已经有很多,需要小心避开,以跟别人有所区别。我做的方法跟钱杭差不多,也是跟着问题走的。但是一旦这样做了,就难免有点深了,所以可能还需要调整,看怎么变得浅一点。



现在有一个部分比较困难,就是我做的魏晋南北朝,海外的特别是日本的研究做得很好,如果纳入进来,篇幅容纳不了,差不多需要另外做一本,可是做学术史回顾又不能忽略掉,不讲是完全不可能的,边界很难划定。所以,我很希望听听各位的处理意见。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我承担的部分,目前基本工作都做了,材料也收集得比较多。关于书目的部分,怎么选取是个问题。东西实在太多,没有必要都放上去。我的书目会比张隆溪的略多一些。历史回顾部分

已经有初稿了。方法和路径部分,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佛教文学研究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小,不像张隆溪讲的比较文学有学科发展,有理论和观念的脉络在。佛教文学本身谈不出什么理论的脉络,现代的学术研究算起来也就是从20世纪开始,没有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所以,我的历史回顾部分本身是事实性的,就是讲哪一个阶段有哪些重要的学者,做了哪些工作。可是这么一来,下面再讲典范的研究就有些重复了,再讲到方法也会有重复,这方面我还有待理清思路,也希望能从大家的处理方法中找到一些启发。



何俊(浙江大学哲学系):能受邀担当第二批作者感到很荣幸,我研究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哲学,简单讲是宋明理学,更偏向思想史,我在浙大主持宋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去年在北大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把文史哲方面的

专家都找来了,就宋学的概念做了讨论,但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把宋学理解成一种学术文化的话,那么明代、清代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范围来。我自己的兴趣,是从新儒学兴起到清代这个范围,从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十

九世纪中叶,差不多也就是从韩愈到清代考证学。所以,我想我的题目可以拟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入门”。当然,这样一本书很难写,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格。从我的眼光来看,中国近世思想史不能不谈宗教,不能不谈文学思想,无论从层面上来讲还是从领域上来讲,涵盖了太多内容,怎么界定是我很困惑的。还有书目的问题,我比较认同陶飞亚的做法,中文的、日文和英文的不妨多列些,仅从书名上也会对研究生有启发,而且他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这些书。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近世思想史的研究,回顾的上限在哪里?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作为第二批作者,我想把题目初步定为“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入门”,这方面因为教课的缘故,我已经积累了一些东西。中国语言学史其实很大,但写小也有写小的难处,比如写《说文解字》研究或者《尔雅》研究,一定要非常有研究才能有所把握,稍微大一些反而可以写得虚一些。回过头来看张隆溪教授的这本,他的学养和眼光在同领域中是第一流的。在考虑我自己写的内容的同时,我看了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教授写的政治学入门、教育学入门之类的书,再对比张教授的,觉得张教授比较温和,

是比较大气的手笔,对整个学科的回顾和叙述较多,操作性的东西比较少。张教授举的例子都很大气,很正面,像钱钟书先生、杨周翰先生、朱光潜先生,这个对于学生来讲其实是蛮难学的。另外,在叙述的时候,可能还要有一点批评,不仅要在后面书目中有所点出,指出哪一些学者做得不好,对学生有警醒作用,学生知道了以后就不会拿着他的东西当经典读。一个操作性、一个批评性,是我在考虑我自己那本书的时候的体会。如果能加强这两点,可能会对研究生更有益处。

葛兆光:对于刚才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想简单回答一些,也顺便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很多作者对写作体例有不同意见,其实只要跟原来提出的目标一致,包括学科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这三部分内容,不管用什么样的章节形式写出来,我们都不会太强求一律。只要保持给硕士一年级就是刚刚进入学术之门的人,提供一个方法为主的目的,我们就接受,不需要在体例上整齐划一。在我看来,最主要的还是给研究生提供一个研究方法,与他本科阶段以常识为主的学习,划开一个界限,进入到个人研究的不同阶段。再有就是不要太拘泥于形式。章节的安排都可以调整,包括字数,我觉得到十六、七万也可以。但不要多出太多,因为这是硕士一年级的入门,所以不需要太深,字数也别太多。对傅杰刚才讲的批评,我持保留意见。在入门书里做批评,千万慎重。如果是个人著作,那没关系,作为入门,还是以正面为主。他讲的操作性一面,我很认同。张的书比较宏观,操作性可以加强一些,比如,可以介绍给学生,这个领域里面还有哪些可以发掘的课题,还有哪里的资料可以用。我们刚才还讨论了参考文献的部分,我想,也不要强求一律。去年提出参考书目的时候,我是受美国芝加哥大学伊利亚德写的《世界宗教理念发展史》的启发,这书一共三册,每一册后面都有至少60页书目,有的附提要。伊利亚德的书目给你的是经典的文献,所以,我也想是不是可以做类似的目录。陶飞亚十万多字的书目是他本人辛辛苦苦搜集来的,虽然没有提要但同样很好,只是希望删一些,希望有一个纵深感,如果能挑选一下,有个层次就更好。张隆溪的书目对于硕士一年级是够的,再往上是否可能就不够呢?书目应该在挑选和陈列之间。陈列是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挑选是展示一个规范和标准。最后,我的一个想法是,这个书是给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使用,所以,我不太赞成太前

卫,宁可保守一点。取法乎上,总是没有错的。



王永珍(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各位老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对这套书很重视。感谢各位专家花精力来做这套书。这套书不光对研究生,对高年级本科生,新任的硕士导师都有借鉴作用。我们现在文科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很大,希望这套书对文科的科研有一个推动。



方晶刚(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这套书从策划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文史研究院从建立开始,并不仅仅定位为科研机构,还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承担着探索基础学科如何发展的责任。复旦文史哲有比较好的基础,但近几年规范性、引导性做得不够。希望通过这套书给学生一个大致的指导性东西。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很多,希望这套书有示范效应,所以,第一批很重要,是有标杆作用的。当然,这套书需要做些宣传,不只是作为著作的宣传,也是作为对研究生培养方向的宣传。这套书代表着对一代后人的培养方向,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出去。□

肖苏、王鑫磊 整理

文史研究院小型研讨会共议中外交流史学科发展

2008年11月27日,文史研究院邀请黄时鉴、芮传明、马小鹤、徐文堪等四位在中外交流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资深学者齐聚复旦大学,与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历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教授、文科科研处方晶刚处长等就我国中外交流史学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文史研究院研究人员许全胜、董少新、王鑫磊等也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认为,中外交流史这一研究方向在国际学术界相当受重视。同时,由于从事这一方向研究需要研究者有较好的外语能力、扎实广泛的文献功夫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较好视野,因此它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一个较难的领域。在我国,中外交流史的研究曾一度能和国际学界进行很好的对话。但是,目前这一学科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因为科研难度大,使得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培养成为一大“瓶颈”,加之一批训练有素、造诣很深的学者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使得这一领域实际上已经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另一方面,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相对分散、缺乏沟通、各自为政,基本上已经没有一个研究的中心或阵地,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一传统优势学科很可能逐渐走向衰弱甚至消亡,着实令人惋惜。谈到未来发展,大家最大的希望是能够重新树起中外交流史这面旗帜,形成一个阵地,聚拢一批人才,搭建一个平台,整合分散之力,重振

这一传统优势学科。

葛兆光教授指出,文史研究院召开此次会议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在推动中外交流史研究和学科发展方面做一些实质性的努力。目前文史研究院推动的“交错的文化史”和“从周边看中国”等研究方向都和中外交流史有关,复旦大学本身不仅过去有章巽先生等开创的研究传统,也有一些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如果得到该领域资深学者们的大力帮助,并通过设立专门工作室、开展研究项目、召开学术会议等具体形式展开合作,相信能够重新建立中外交流史学科的传统。文史研究院愿意运用自身资源,搭建这一平台。

章清教授表示,历史系将和文史研究院合作,共同采取一些具体举措来推动中外交流史学科的发展。历史系将把重点放在教学与人才培养上,借助文史研究院平台的集聚效应,邀请资深的专家学者以讲学、定期或不定期授课、担任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等形式,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激发他们对中外交流史的研究兴趣,发掘并培养年轻一代人才。

顾云深教授谈到,推动中外交流史学科的发展,对人才培养国际化意义重大。一方面,接受过这一学科训练的,一定是同时具备中、外两方面知识和文化素养的人才,在当下国际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此类人才是紧缺型人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中外交流史是国际学界热点,也是能吸引国外学



者和学生兴趣的学科之一,通过文史研究院搭建的平台,借助校内外优质师资,开设中外交流史的对外课程,对我校的留学生培养,特别是准备重点推进的硕博高阶留学生的培养工作,是十分有益的,将有助于提升我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整体水平。

方晶刚处长总结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作为“98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核心使命是推动我国人文基础学科的发展,同时保存和发扬我国人文基础学科研究的优良传统。文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的、打破学科和单位边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这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有效形式。通过文史研究院搭建平台,历史系全力配合和参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一个中外交流史的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队伍在复旦大学出现。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软硬件条件,文科科研处作为学校职能部门将会给予大力支持。

会上,黄时鉴、芮传明、马小鹤、徐文堪等四位学者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的提议及设想深表赞同,并表示十分乐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他们还就项目合作、讲学授课、参与研究生指导等事项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方式与两个单位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初步达

成了合作意向。

与会学者简介:

(1) 黄时鉴(193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退休教授。中国对外关系史的权威,精通蒙元史、中亚文化史、中韩关系史,目前研究欧洲所藏有关中国的文献与图像资料。

(2) 芮传明(1947年生),199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突厥史、摩尼教和中古西域史地,精通突厥文。

(3) 马小鹤(1949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毕业,1996年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燕京社图书馆工作,从事摩尼教、粟特文文献、西域史地研究。

(4) 徐文堪(1943年生)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曾任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编审、四川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古代中亚历史和文明研究,精通吐火罗文。□

王鑫磊

復旦文史講堂

田 浩
(Hoyt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朱熹研究在美国：
以陈荣捷、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

桑 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陈庆浩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

汉文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

复旦文史讲堂以学科交融的视角,探寻传统文史研究的前沿发展,尤其注重展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中的中国视境。自2007年3月以来,已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作了三十七场学术讲演,成为复旦学子接触学术前沿的窗口。本期刊出最新四场讲演摘要,以飨读者。

朱熹研究在美国： 以陈荣捷、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

田 浩 (Hoyt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田浩 (Hoyt Tillman), 哈佛大学博士,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从事宋元思想史研究。著有《功利主义的儒家: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朱熹的思维世界》、*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 等, 编有《宋代思想史论》。

时间: 2008 年 10 月 27 日

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系吴震教授



这个题目可能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国朱熹研究的情况。美国的方法论不同, 而且写文章的方式不太一样。我的意思不是美国的方式好, 只是传统不同而已, 中国有自己的写法。

我先说一些背景, 然后讨论三位学者的研究。明朝末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起初他们认为佛教比较流行, 便于传教, 就身穿佛教的衣服, 但是中国人把他们看作佛教的另外一种, 而真正有地位的人, 如士大夫是不穿佛教衣服的。对中国传统情况有所了解后, 传教士们开始学习中文, 并找到了一些——特别是从儒学上——与自身宗教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得出结论, 孔子、孟子 and 五经这一类古代思想较接近欧洲天主教的思想, 而朱熹的四书和科举的影响则把儒家

的传统理性化, 改变了儒家的古代思想, 不太适合天主教。尔后, 传教士把所做的这些改变汇报到罗马。这在欧洲引发了辩论, 有人批评他们将天主教与儒家思想混为一谈。

这一背景还有另外的重要性。耶稣会传教士把孔子、孟子提出来, 其地位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高, 认为孔孟更适合天主教的教导, 于是就把孔子变成了 Confucius。除了古代思想家外, 这一系统并未继续传承, 比如没有把朱熹变成类似拉丁文的叫法。事实上, 他们看重汉代之前的中国思想, 这对后来的美国有很深刻的影响。随后很多人用德文、法文、英文等翻译了《论语》、《孟子》和《道德经》。然而, 宋代的相应材料却少有人译成英文。



下面来看陈荣捷的研究。陈荣捷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位华人,在夏威夷长大,哈佛大学的博士。做研究生时,他专门研究中国哲学。有次答考,他的一位老师洪业先生问他一个关于《道德经》的问题。陈先生很难回答,因为当时他只对儒家的思想感兴趣,对老子等几乎没有兴趣。陈荣捷要做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尤其是要改变美国人对儒家思想的看法。为此他有两个很大的方案,其一是他翻译了很多宋代的材料,或许最有名的要数《近思录》。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另一个大方案,他觉得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的立场在欧美文化界影响太深,一般欧美的知识分子所知道的孔子或孟子受到西方宗教背景的影响,他要改变这一状况。

1982年我参加了在夏威夷召开的一个关于朱熹的国际会议。我做了一个报告,关于朱熹所提及的“天心”,并就此做了一些哲学上的新的考察。做报告时,我便注意到陈先生很有意见,可是他没说什么话。会后,因论文集里前辈的文章已足够,我就把自己那篇文章改定寄给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杂志。他们转给了两位审稿人之一的陈先生。尽管审稿报告未写姓名,但是其立场鲜明,我很清楚是谁写的。陈先生看了,火了,说老外看中文太少,把“天地之心”糊里糊涂看成了“天心”,不必考虑。大概83年,在长沙的旅馆,我又遇见了陈先生。他觉得我是要把朱熹改成一个基督教徒,强调“天”是耶稣会传教士把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配合。从那时起,我们就有机会交换意见。后来他也收到了我寄去的《朱子语类》中相关的段落。他必须承认朱熹是利用了这个字,尽管他一直觉得在朱熹思想里完全没有“天心”这个意思。

了解陈先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立场。他本人相当佩服朱熹。大约是1987年,国内在厦门开了讨论朱熹的会议。会后,陈先生去了朱熹的坟墓。那时他年龄很大,仍在朱熹的坟墓前磕头,而且磕完头说,他一辈子向两个人磕头,一位是他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朱熹。他在美国要实行朱熹的那个道统,可以说把自己也绑在那道统里面,以代表朱熹的思想。你们看他翻译的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手册》)。

那本书从五经开始,一路下来,可是关于宋代那部分,就是北宋五个主要人物,周敦颐、二程等等,而南宋只有朱熹和陆九渊。金元也没有,陆九渊就到王阳明。我与陈荣捷的研究方向有不同的地方。虽然我承认他有很多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总以为他研究的这个范围有点太窄了。

例如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陈亮和朱熹的辩论。我觉得陈亮有些话非常清楚。他胆子特别大,而且敢说。与朱熹辩论时,他说,那时老子等一些人对古代很有意见,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三代等等很有怀疑,对政治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孔子把历史材料洗干净,给政治一个大的希望。再进一步,陈亮就说朱熹你应该跟我合作,把汉唐的历史洗干净,做我们当代的“正本子”。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问题是新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看到这些材料,就觉得中国文化很复杂,有多元性,有用的观点在朱熹的那个正统里不多,而在那个正统之外却有很多好的意见。同时晚年陈亮等人的一些看法有时比较接近我们当代问题,所以更适合做当下的研究。

后来我写的《朱熹的思维世界》一经出版,美国的一些学者很有意见。他们也不看我之后在中文版内对他们的回应。我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同哥伦比亚大学的陈荣捷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辩论。陈荣捷先生虽然并不正式在哥伦比亚开课,但是他每个月有一个周五是要到了哥伦比亚讲学。讲学之余,他就留下参加新儒学的座谈会,每月一次。可是我有一个困惑,就是看很多人的文章,他们乱用道学、理学和新儒学,而且他们没有说清楚这个词的含义。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儒学座谈会上,最重要的三位学者,他们利用“新儒学”这个词就有相当不同的地方。陈先生的用法是周敦颐、二程到朱熹,很窄的范围,很清楚地受到朱熹本人,以及元代所编的《宋史·道学传》看法的影响。这是狭义上的“道学”。狄百瑞的用法可以说是相反的。我与他辩论以后,他说得很清楚,“新儒学”比较接近“理学”,可是比“理学”还要宽,所以他把“理学”的范围再扩大,就是“新儒学”。俩人经常合作,每个月开会,不过看起来,他们并未注意到在用词方面是相反的。第三位是谢康伦



(Conrad M. Schirokauer)。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他的立场同他的两个朋友也有很大区别。他注意到了我写的陈亮那本书。他看得很仔细,我避免用“新儒学”这个词,而是用“道学”这个词。他与我探讨过这个词。谢康伦的看法是,“新儒学”不是“道学”,不是“理学”,与所有中国所用的词汇不同。“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我们欧美的一个词,因此我们要它包括什么,就包括什么。虽然我觉得谢康伦的说法有问题,但我很佩服他想出来的理由,并很清楚地表述出来。所以我强调无论是用“道学”还是“理学”,希望能说清楚你用的这个词的范围是什么。

现在讨论余英时老师《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本书。余先生对朱熹的研究很有意义。我是他早期的学生。他多半的学生是东方人,他们了解得比我多。评论自己老师的书有点不方便,可是我没有办法,必须讨论。原本我不想写书评,可是杂志社压力很大,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哲学》杂志发表了这一书评。

1970年他第一次到台湾,碰巧我就在那。我非常高兴,就去拜访他。他说要不要去拜访钱穆先生,我说那更好,他就带着我去了。这次拜访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钱穆先生的房间内到处都放有朱熹的话,钱穆先生还自己用毛笔写下来挂在墙上。说到钱穆先生,起初,他可以说是一位考证的历史学家,对宋学包括朱熹,有反感,因为他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可是到他晚年,他花了很多工夫来写《朱子新学案》。那时国内文革,朱熹不受欢迎。他就特别在那个时候要写这样一部书。余老师过了七十岁后,对朱熹很有兴趣,在这之前对朱熹兴趣不大,主要在汉代和清代。所以当初我做朱熹的研究,他总有这样的一点意见。我的朱熹的这本书和他的那本都是由台湾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的,而且两个书名很接近。然而他书名的这个改变

也表达了他的意思。在我看来,同狄百瑞辩论,我是强调历史和政治文化斗争。可是从余先生的这个立场,我做得不够。他就把“思维”用“历史”这个字代替,觉得我在历史方面不够,不够强调政治文化斗争。另外,他写那部书时,几次打电话来,与我讨论宋代的历史和思想,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好像他写这本书是他一辈子,至少我有机会看见他的时候,最快乐、最得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一点像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到年龄大了就变回到研究朱熹的思想上。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在我看来,虽然他有这个立场,批评哲学家过于注重抽象的问题,强调我们要注意到宋代的政治斗争,而且他对道学和理学的分别说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研究这些,此外现在大家都用“理学”这个词,所以他也就用“理学”这个词。而这对他所要表达的立场有一点不利,因为他用的这个词已经具有哲学性的含义,而且消灭了政治文化的那部分。

总之,希望大家能借此完整的“路线”看得更清楚。几百年以来,开始西方没有太注意宋代的思想,而多注重古代先秦部分,之后才注意到12世纪朱熹的思想。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陈荣捷老先生。他之所以要强调朱熹,就是针对美国世界,针对基督教、天主教对我们了解朱熹的影响。我自己研究朱熹,一方面因为它是宋代以来的思想,可以利用朱熹与其他宋代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的辩论来了解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人了解,儒家思想是多元性的。当然,朱熹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余先生的这个例子就更清楚了,他与陈荣捷的承担完全不同,他有政治上的意义。你们看他的书就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赵嗣胤 摘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桑 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国学与汉学》、《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

时间:2008年11月12日

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



我们今天讲所谓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要讲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了解之同情不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第二,了解之同情是针对什么而言的;第三,陈寅恪自己的治学方法到底是什么。

先讲第一个问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说了下面一段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很多学人都根据这段话把了解之同情当作是陈寅恪的一种治学方法,比如王永兴先生。另外,严耕望先生在讲陈垣和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的分别时,说陈垣是述证,陈寅恪是辩证。实际上,史学二

陈的治学方法是不是有明显的分别,显然跟那个时候对了解之同情的解读有关。

所谓了解之同情在陈寅恪那里有很多例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说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自己的方法呢。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材料不够,所以一定要以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才能了解他真实的想法。但他在上面引的那段话之后接着说了另一段话,“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这种排比解释就有一个系统,往往会用自己的境遇、环境的影响跟知识去重新建构,这样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把这些话



联系在一起就会很明显地看出,陈的意思就是了解之同情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材料不够。通过解读《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我们澄清了“了解之同情”并不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更不是他自己的治学方法,他对了解之同情的办法所持的态度基本是否定的。

第二个部分要讲的是,了解之同情不是陈寅恪自己的治学方法,那它是对什么而言的?当然是针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言。那么了解之同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可以说它是一个有条件的肯定。说是有条件的,是相对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的整理国故,一个是当时的古史辨。这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讲得非常明确。他讲到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去古人真相愈远的时候,首先举的例子就是那个时候讲墨学的人,而他认为这是当时整理国故的一个普遍问题。第二个就是古史辨的偏弊。古史辨作为破坏是有功的,但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古史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眼光。历史的事实是要靠当时的记录和后来的一些说法才知道的,而所有的概念性集合都是后出的,所以会有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的情况,但这会有偏误。古史辨只看到了前面的问题,但不知道后面不断发展出来的集合概念的源流变化仍然是一个历史。

陈先生为什么否定古史辨呢?因为他说古史辨一个是翻案文章,再就是有否定所有的中国古史的偏向。陈先生把冯友兰的书跟顾颉刚的古史辨比较,认为冯友兰的做法还有史学通识的。这是陈先生相当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而言对冯友兰的书的肯定,以及对冯友兰的了解之同情的做法的肯定。但我们不能由此就说这是陈先生本身的治学方法。这在陈先生《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讲得更加清楚,涉及陈寅恪先生对两宋的学问的看法。

陈先生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表扬是说他用了西洋的哲学概念去解紫阳之学,他觉得自成系统,别有创获。但其实陈先生不太赞成用西洋的系统来调理中国的史实。陈先生认为,中国最高的学术思想的代表时期就是两宋。但陈先生对宋的认识跟后来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是有很大分别的。他认为那是

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高峰期。如果用陈先生那样的标准去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下册,很显然,它跟陈先生本身心目中所期望的距离相当远。

我下面讲第三点,就是陈寅恪先生治史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简单地说,对于历史,他的做法就是长编考异之法。从文献的角度,包括内典的角度,可以说就是合本子注。但是从思想的角度,或者从他的哲学的角度,他对于格义的办法也不否认,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推崇。

作为历史本身而言,他用的还是长编考异的办法。最能体现陈先生的一个认识的,其实是在1948年为杨树达《论语疏证》所写的序。这代表了他希望通过对杨树达的著作的评论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按照陈先生的说法,杨树达所用的办法跟宋学,也就是宋代司马光那些人治史的办法是一样的。为什么说长编考异的办法是陈的基本和主要的办法呢?长编考异的办法到底有什么高明呢?傅斯年讲史学就是史料学,其实有两点:第一,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可以相互比较而近真。但近真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真”这件事情究竟如何?二是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去记录这件事?我们永远不能重合历史的真实,也永远不能去重合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去记录这样一件事,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考究逐渐接近,在接近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以提高我们的智慧。只是,这就要有一个历史本身的时空联系,要借重外面的很多的理论、框架、条理。傅斯年除了讲到近真以外,还讲到第二个词,他说不同的事情之间有关系,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常常说研究历史要讨论规律。按照马克思经典的解释,规律就是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对历史而言,所有的事情都有联系。对于这个联系,我们通过比较,掌握联系的脉络头绪越多越远,对历史的所谓规律就掌握得越多。近真与联系这两点确实讲出了历史最重要的做法。按照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看法,这是宋代,特别是北宋的学者做史学的办法,即长编考异的办法。

做文献跟做佛经的本子考证的时候我们要比较,这就是陈先生讲的合本子注的办法,就是把不同本子拿来比较,比较哪个是本文,哪个是后来附加的东西。



合本子注的方法是陈先生非常肯定的办法,虽然它跟长编考异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但做法是相通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办法,那就是格义法。这种格义的办法在近代特别多,就是拿中西学说来做比较傅会。这种格义傅会的办法在比较研究的领域当中,陈寅恪是痛批的,但是在思想史的层面、在哲学史的领域,他是赞成的。朱熹的理学其实就是一种格义傅会,但实际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接受印度佛学当中中国特别缺少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的那些东西,不过为了说这个东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他又从先秦典籍中去找,这就是《四书》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宋代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这显然不完全是史学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朱熹他们的理学把中国

的所谓思想学术推到了一个高度。

我们到现在为止,真的有了哲学吗?哲学很复杂,跟日本有关系,中文中没有这个词,这是日本人根据中国古代的一些东西创造出来的。冯友兰他们的一套办法,就是用西洋的哲学来整理中国的古代思想,这套办法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但是问题也非常多。这个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研究走向的影响仍然在。但是这样的走向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真的还能够懂中国吗?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有一段话,他说,他这多年的经验表明,用西洋的框架用得越少,贡献就越大。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好好反省。□

王弘侠 摘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

罗志田,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裂变中的传承》、《国家与学术》、《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等。

时间: 2008 年 11 月 13 日

主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



陈先生说过, 在解释古书的时候, 要“不改原有之字, 仍用习见之义”。但他有时候故意“不改原有之字, 转用新出之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这样的。他在 1933 年曾经说过短短一句话,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 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是他写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里面的。

历来对这个话的解释不一。冯友兰认为这是陈先生实述自己具体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情况。可是当过陈先生学生的邓广铭根本否定这种说法。他们都是在八十年代末说的这些话。但直到现在, 我们对这话的理解基本上还没有共识。不过, 我们可以通过解释或了解其他人怎么看这句话, 来探索陈先生自己的思想、

学说及处世方式。

逯耀东很早就说这话跟今古文经学有关, 但又说也可以作为专治史学中的魏晋隋唐史来讲。这话有一些问题, 因为前面的“平生”很重要。平生当然指以前, 可陈先生做魏晋隋唐史是在 1933 年以后。汪荣祖说“不古不今之学”就是指中古史, 他的说法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后来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桑兵就说这话跟冯的著作的审查有关。桑老师比较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是中国大陆首个支持逯耀东说法的人, 认为“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跟经学的今古文有关。李锦绣的理解更加具体, 她把陈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跟另外一句“论学论治, 迥异时流”联系起来, 认为那句话是解释这个的, 具体的“古”指的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



顾颉刚他们的疑古,“今”指的是胡适他们的整理国故。程千帆说这些人全都在胡说,尤其提到汪荣祖的说法与事实不合。程先生的贡献是指出了这个话出自《太玄经》,并特别点明和此话相配的是“童牛角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清涟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理解这个话最关键的是“童牛角马”,可惜他没有具体说为什么。黄先生说它的意思是兼涉的、调和的、不古不今、不旧不新、不中不西、亦古亦今、亦旧亦新、亦中亦西。我想这个说法大致接近陈先生的意思。

按照陈寅恪先生自己的做法,解释词句,首先要认识作者的直接动机。陈先生在讲到用典的时候,提出了几点:第一,这个典故必须发生在要考证的这个作者做文之前;第二,要考虑用典的人对这个典故有听说和见到的可能。我今天就尝试用陈先生的方法来考察他到底用的是哪一个。《太玄经》是汉代的,基本上是符合所有这些规定的。此外,还有一些也符合这些条件的表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

除了《太玄经》,陈先生还有闻见之可能的,就是杜牧的《献诗启》。那里面就有“不古不今,处于中间”。缪钺对杜牧钻研比较深,他把“处于中间”解释成是不受两派之影响,还要摆脱时尚,自创风格。另外,道教的精神中其实也有类似不古不今的表述,《庄子·大宗师》就有“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成玄英给《庄子》做的疏里就说这就是“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我觉得这跟缪先生解杜牧的意思是一致的,很接近陈先生心里想的。另外还有一个《关尹子》,但大部分人把这本书视为伪书,陈先生不一定要用它。

三个中间到底是哪一个,或者三个都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肯定。另外陈先生指出,要注意作者的直接动机以及他这个作品究竟想要做什么。这个作品是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那应该倒过来看一下这本书。陈先生审查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册和下册,在审查报告里有一个直接的表述,就是冯友兰在开头和结尾都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表述中国的文化或哲学到了什么程度。陈先生明确表态,主张用新瓶子装旧酒。这跟他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本书不改旧籍的规模,又要表述新知的创获是一致的,就是要

在新旧中间找到一个结合。

晚清提得很多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陈先生这句话的后半句“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近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葛兆光老师特别强调的甲午。在甲午以前和以后,同样的说法表述的是非常不同的意思。张之洞的《劝学篇》被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征。这当然是代表甲午或者以后的事。

大部分人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就说陈先生要区隔时流。他想要划清界限的一些人不仅有胡适,也包括梁启超,包括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勱这些被列为东方文化派的人,也包括很多人直接把陈先生算进去的学衡派。所有这些人,他们的见解都有一部分是和陈先生相通的,可是也有相当程度的不同。所以“不古不今”就是要跟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他在《四声三问》里很明确地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成是同光的思想,而说不成是咸同的思想,这里面应该是很有分寸的。我想,这个话是有它的直接含义的,就是他对张之洞有认可的一面,也有不认可的一面,所以他要回到张之洞之前。

他为什么要回到曾国藩呢?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基本指的是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学说,而且他是主张“损之又损”的,这是《老子》里的话,下面就是“以至于无”。如果损之又损是可以以至于无的话,那“中学为体”基本就是一个象征了。而曾国藩是把当年的考据、辞章、义理、经世和孔门四科连起来的。简单说来就是,曾国藩时代的“中学”比张之洞时代的范围要大得多。陈先生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保存中国的某种东西,但是要接受另外的东西,让它发生转变。我猜,他之所以要回到张之洞和曾国藩之间,是希望有一个更宽的以维护中国的东西。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陈先生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词“非驴非马”要放在一起理解。他始终指出“非驴非马”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融合胡汉为一体。这个跟他后来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直接的关系。他曾经明确地说,李唐一族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取了“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我想



这基本上就是“不古不今之学”想要做到的,但关键是要别创空前局面。这是“童牛角马”的一个含义,“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相反而适相成”。

陈先生讲“不古不今之学”不一定讲他做中古史,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说的“平生”是1933年说的,此前他基本上没有做多少中古史。陈先生和章太炎都曾经反对民国新史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国新史学比较偏重研究上古史。章太炎曾明确说,上古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当时没有借鉴作用,不能致用。唐代这个时候是一个中外接触频繁的、各种文化碰撞的时代,比

较切近近代。所以陈先生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本著作,他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想在里面,就是要报国。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两次说到童牛角马,都是要特别强调中古的这段历史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不能说陈先生的“不古不今”之学就是要做中古史,因为那是后来的事,但是他往中古史转移,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一个读书人总要以某种方式来为国效力,若不上前线打敌人,也应该有某种表述。□

王弘侠 摘

汉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



陈庆浩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陈庆浩,巴黎第七大学东方学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世界各地的汉文小说和汉文化。著有《红楼梦脂评研究》、《新发现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汉文小说》等,编有《越南汉文小说丛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等。

时间:2008年12月8日

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



汉文化整体研究,“汉”是汉字的汉,指的就是汉字除了在中国应用之外,过去在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以及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用,在这样一个应用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了大批的汉文文献。另外,从近代到当代,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他们在居住的地方,比如在欧洲、在美洲、在东南亚,一方面是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保持了用汉字写作的习惯,所以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看到一些华文报纸,这一类的华文报纸以及那边的华人,也有用汉字来写作的。所以我们讲汉字文化,整个来讲,就应该包括这两方面,就是,以中国作为主体,中国用汉字这个传统没变,从古代到今天,我们还在用汉字,另外,就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他们有相当长的时间使用汉

字。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传统才慢慢地消失。所以说,汉字在古代,就是以中国为主体,以及周边的几个国家,使用汉字的一种现象。古代的汉字文化圈在当代相当淡漠了,有一些中国人在国外用汉文继续写作,我们叫华文文献。

现在要讲的是古代的这个部分,就是越南、朝鲜、日本、琉球这些东亚国家,用汉字写作的传统。当然其中也有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传教士当年来到中国,学会汉语,为了传教,他们也用汉语来写作,有的是在中国写,有的是在中国以外的东南亚各个地方写。这些资料大家不太注意,不过假如我们要讲汉字,整体来讲,这一部分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大家也知道,中国人其实很早就迁居到国外,特别是东南亚,二十世纪以



前就有大批的中国人住在那里,而且在那里建立过国家。我们讲汉文化整体研究,就是指以中国为主体,包括周边使用汉字的这些国家,以及少部分的西方传教士,或者是一些中国人在国外写的这些文献,这属于古代部分,而我们暂时不处理当代的部分。

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要对这个汉字文化圈作一个整体的研究,不单是中国人做中国的研究,还包括日本人做日本的,朝鲜人做朝鲜的,因为他们有某种共同性。这个提法原因也很简单,我从六十年代就去了欧洲,而欧洲在二十世纪是一个变动很大的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觉醒了,五十年代初,他们建立欧洲的共同市场,慢慢地发展到经济的合作,政治的合作,后来发展到欧共体,再到今天的欧盟。而东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当年我在欧洲生活的时候,东方正好是一个社会动乱的时期。所以我就觉得,欧洲给我们提供了未来世界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就是,世界各地有一种板块化的趋向,单个国家已经不能够孤立地存在,他们需要合作起来,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欧洲正是提供这样一个试验,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试验。然后我就自然想到,东亚这块地方,近代也是一个战乱的时期,互相冲突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亚应该像欧洲那样有一种合作,未来的趋向是东亚有一种联盟的可能,就好像欧盟这样的模式。当然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经济的需要、政治的结合,而背后还需要一种文化的力量,而东亚这个共同的文化圈里,其支柱就是汉字,就是汉字文化圈,所以在当时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这是背景。

那具体是怎样做的呢?最早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思考和观念后,我在台湾推动这个工作,得到那边学术界的支持,发起了“中国域外汉籍国际研讨会”,后来就转变成一些比较专门的会议。1986年,第一次会议在日本明治大学召开,当时我认为,汉文化整体研究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目录,就是各个地方的古代汉文作品。中国当时已经有汉籍的善本书目,但是越南汉籍没有目录;韩国的汉籍没有一种总的综合性目录;日本没有专门为汉籍编目录,所以当时开会,推动了编纂目录的工作。后来我在法国建立了和越南的合作,编了越南汉籍目录,这个目录当时是用法文和越文出版,后来台

湾和大陆有人将它编译成中文。目前越南这个目录还在继续在做,还继续在找越南当时没有编入目录的书。还有越南的书除了留在越南之外,还留在日本,留在中国,留在美国,这些目录还继续在做,这个是目录方面的工作。韩国方面最近也出版了一个总目录。到今天为止,日本方面还没有汉籍的目录,这个非常可惜,其实日本汉籍的相对数量不会太多,所以我还是希望日本有一个汉籍目录出现,希望中国可以和他们合作来做。建立目录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要求一种国际性的合作,这是一种大家的合作与联合,也只有将目录做好,才能做进一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远远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做下去。

除了编目之外,我个人比较集中在汉文小说方面,为什么在小说方面?一方面,我个人做了一些中国小说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整个东亚的传统中,小说就是一片大家最少注意到的领域。所以,今天很多越南或者朝鲜的汉文小说还是钞本,因为过去没有著录,没有人做研究,而这样的工作很重要。以越南为例。在我们做越南汉文小说整理之前,越南的文学史中没有小说这个门类,后来因为我们整理出版了一批越南小说的资料,学术界才知道有越南汉文小说这样的一种门类,所以这个工作很有意义。然后希望出版韩国的汉文小说、日本的汉文小说,接着处理传教士以及其他东南亚一些华人写的东西,这样一来,再加上中国小说资料,将来这样就有一个总体的资料,才能够谈到总体的研究。

除了汉文小说之外,我也推动了另外一个研究的项目,就是东亚汉文化圈内怎么样互相彼此了解和认识。在西方势力没有进入东方之前,东方世界就是以汉字作为共同的媒介,这是我们互相交流的工具。我有一个研究计划,就是研究在西方列强没有到东方来之前,东方人彼此是怎么样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因为这里有大批的材料,比如这些国家彼此来往的使者,朝鲜有很多燕行录、朝天录,这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官方文书,但是远远不止这些。这个工作大概在二十年前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想做越南和中国之间使者来往的报告、诗歌这一类资料,汇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互相了



解。当时是怎样互相的交往,互相的印象,我们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我们是不一样的,官方文书的记载,跟私下的记载又不一样。假如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全方位地看,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当然还不单是包括中国和别国的关系,也包括日本和朝鲜、日本和琉球、日本和越南、越南和朝鲜,就是东亚世界彼此是怎样交往的,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在汉文化整体研究的工作中,我觉得中国人最喜欢写关于影响的研究,就是中国人怎么样去影响别国,或者说我们对越南、对日本、对韩国有什么影响,都是以自我作中心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文化中,我们要做整体的研究,只有将整体的研究做好,才能将个体的特殊性表达出来。文化这个东西,它在什么地方发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值得将它讲下来。但是,一个文化是拿来为人所用的,它为你所用,就是你的,文化

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不要过分地去强调影响的研究。文化的根源是一个历史现象,需要我们知道,但是并不重要,假如这个文化不能够保存自己的东西,或者是人家有新的发展,就是变成人家的。所以,中国人做研究特别要注意,就是可能有很多东西是在中国发生的,是中国的,很好的,但是假如自己不保存,没有发展,而是别人在发展,那么,谁能够用它就是谁的。文化研究,不能够老是盯着自己,以自我作中心,要从整体来看,我只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我这里有什么特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样可能对我们的研究会有帮助。

我想让大家知道,在做这种整体研究时,有些什么观念要抓住,不能够太过分注重影响的研究,要从整体来看问题,也应该突出个体的特性。□

姚建根 摘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

为增进学术交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复旦文史讲堂”之外另举办一系列小型学术研究会,由我院研究人员和访问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第一次研究会由葛兆光教授作学术报告《国家与历史——从有关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日本天皇制度的争论说起》,本期刊出的《声入心通》和《见鬼人与返魂香》是第二次与第三次研究会上的报告,两篇报告分别从“切音字运动”与“巫觋”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社会精英对塑造新国民的关切,以及巫觋文化对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

声入心通:切音字运动与清季思想界塑造国民的努力

王东杰 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四川大学教授

19世纪90年代初,一批受到基督教会启示的中国读书人认为,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字数繁多,笔画繁琐,而且与口头语言相去甚远,掌握起来相当困难,以至于中国人的识字率过低,因此,欲图富强,首先要创造一种能够直接反映口头语言的“切音字”,便于“下流社会”学习。甲午战败之后,这一看法作为“学战”思想的一部分,在国内思想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庚子以后,切音字运动直接和国民思潮联系起来。鉴于政府救亡和改革均不成功,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广泛出现了目光“向下”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强调,救亡不能仅靠少数“人才”,而必须依靠国民,尤其是其中的“下流社会”。“多数人”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肩负着中国的未来。然而,另一方面,民众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又使思想界不安。他们认为,下流社会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而开民智乃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切音字的“普及”作用更显突出。

在这种情形下,切音字被视为塑造国民的重要手段。支持切音字的学者认为,由于切音字是一种“言文合一”的文字,可以“声入心通”,特别适合下层民众。这和其时思想界兴起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演说和宣讲运动、戏曲改良运动以及稍后出现的“歌谣运动”和“方言调查”等互相呼应,可以视为“口头文化”(及准口头文化)地位提升的表现,而所有这些“口头文化”也均把下层民众视为关注的对象。

由于强调文字应该反映声音的状况,以及无意中脉承了传教士的做法,切音字运动兴起之初,出现了一大批拼写方音(以南方为主)的切音字方案。这在一开始并未引起过多的质疑。不过,庚子以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广,语言文字被提升到国家精神的高度,而统一语言更被认为是合群的关键。这样一来,不少人开始把方音切音字当作国语统一的障碍而批评。

实际上,在切音字运动内部,原本也存在着统一语



言的目标。不过,具体方案则有所不同。其中一派的代表是北京的王照。他制造出了一种直接反映“京城声口”的官话合声字母,被认为可以同时促进“教育普及”和“语言统一”。另一派的代表是在南京推广切音字的劳乃宣。他认为王照方案并不完全适合南方,故主张在王照方案的基础上,按照各地情况随时增添字母。但是,劳氏的办法被认为“极力制造”语言分裂,不但不能统一国语,且使本来举国一致的文字也有分离之势。另一方面,王照官话字母在南方地区也遭到质疑,认为其不适宜南方的口音,不但不能提升识字率,且使人更觉麻烦。

这两场争论一是针对方音切音字,一是针对官话

切音字,在正面的主张上确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之处,但在具体的思路又彼此纠缠。一方面,破坏“书同文”显然已成为相当多的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对于这一本来也部分包含有“统一语言”目标的运动不能不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切音字运动者最初的关注点主要是为下流社会提供一套求知和交流的速成工具。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语言统一渐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争论不但暴露出切音字运动在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之间的支绌,且对于南方民众来说,官话简字仍是与他们的口语不同的一套文字,“言文一致”的问题仍未解决,“声入”未必“心通”。

见鬼人与反魂香:中古巫覡文化的一个社会史考察

孙英刚 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

见鬼人是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曾经活跃在政治、社会生活、医疗、文学世界以及精神世界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凭借“见鬼之术”,或者自己与死者沟通,或者令本不能见鬼者见鬼,进而影响中古时期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返魂香由一种具体的东西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象征意义的东西,由救死扶伤的医药演变成为召返亡魂的道具,在见鬼人手中既充当了现实的工具,又担当了沟通冥界的手段。见鬼人和反魂香,勾画出了中古时期巫覡文化影响社会生活、医疗、文学以至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是中古中国社会史图卷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在探讨了“见鬼人”这个专有词汇在历史文献中的流传之后,文章从厘清中古时期“鬼”的概念入手,探究见鬼人作为巫覡之身份,在沟通人间、冥界时和佛教、道教、文学家和专业医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语境中探讨“鬼”的概念,笔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中的“鬼”,既区别于其他文明,又跟当时代的佛教有别。佛教没有灵魂的概念,六道之中虽有“恶鬼”,但是“恶鬼”也有肉身,还可以死亡,只是“格义”的结果。但是佛教在面对中国传统的灵魂—肉体概念的时候,进行了融通的解释,从而影响了这个时代讲“鬼故事”的风格和手法。“见鬼人”虽然被道教和佛教所排斥,但是后者们却

在很多技术层面借用了巫覡的做法,而且侵入了巫覡的业务领域,充当起了沟通人鬼的角色。

通过对这一时期具体例子(比如崔善影、雍文智、彭君卿等)的分析,笔者认为见鬼人在中古时期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比如迁宅)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见鬼人的最重要的两项业务,仍是看祟(治病)和招魂。前者要和医生竞争,后者要和宗教精英们竞争,两者都要借重反魂香。笔者从史料记载探究了反魂香作为一种意念上的东西如何从治病的药物演变成为招魂纳魄的道具。并且可以从日本资料看出,反魂香的招魂功能是被广泛认可的。Hangonkō(反魂香)在日本文化中是一个常见的概念,而在唐代的诗歌中,反魂香也象征着对亡魂(特别是恋人)的追思。

见鬼人由于他们的特殊技能,在中古时期的“鬼故事”中,经常充当证言提供者的角色。虽然佛教和道教排斥他们,但是在讲述感应故事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见鬼人,通过他们的证言增强自己讲述的可信性。同样的,医生和见鬼人虽然是竞争的关系,他们有时候也会让见鬼人为自己的疗效作出证言。很多医生,本身还兼有见鬼人或者宗教精英的身份。从巫覡的角度看社会医疗史,也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新书介绍：艾尔曼、包弼德、李孝悌、高桥智等

• 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系教授艾尔曼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于 2006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该书是 2005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面面观, 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的节略本, 目的是向美国学生提供一种得以窥视 1600 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状况的教科书。此书并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做局部的历史审视, 而是聚焦 1600 年到 1900 年间的中国自然研究以及文人对欧洲自然知识的掌握情况, 并特别说明了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分别在 1800 年前后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推动和抑制作用。

全书共分七章。在第一章《耶稣会士的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会士通过从欧洲引入新的数学、天文学知识和器具化解了明清时期皇家制历工作的危机, 他们对中西知识的差异采取调和的姿态, 故而并未

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 尽管如此, 其译作仍然成了中国文人获得新知的渠道。

第二章《复原中国经典》讲述了清朝前期热心实证研究的中国文人受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激励, 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 致力于自然研究, 部分地恢复并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数学方面的研究传统和方法技巧。

第三章《中华帝国制造业和贸易的兴起》回顾了清朝人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在钟表制造、玻璃工艺和庭园建筑上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中国的瓷器独霸当时的世界, 而印刷业的兴盛推动了书籍的流通和知识的传播, 但欧洲最新发现的科学成果却并不为中国人所知, 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请求表现傲慢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第四章《科学与基督教传教活动》主要关注十九世纪中后期来华传教士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从事的科学传播活动, 这些人通过开办医院、翻译书籍、编辑报刊等方式把西方的科学和医学发展动向传入了中国,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在接受西学上的滞后状态。

第五章《从教科书到达尔文: 现代科学的到来》以艾约瑟的《格致启蒙》十六种为例探讨了十九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在对中国人进行科学普及时保留的自然神学态度; 不过, 傅兰雅在上海格致书院主持的格致课艺成为时人获得西学知识的来源, 其问题及答卷显示出官员学者和民间知识文人对西学的理解程度, 有人

甚至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已经了解达尔文的学说。

第六章《官办兵工厂激励新技术》考察了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为代表的晚清西式机构在推动中国人接受更多的军事技术训练和西方科学教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为王朝服务的新教传教士对西学传入中国的贡献,并通过对中法、中日战争的结果做出战略和技术分析,重新思考了晚清的自强改革和洋务运动。

第七章《中国传统科学和医学的转变》分析了晚清的知识个体在接受西方科学和医学上的融和态度。十九世纪的中文科学译著对维新派的认识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也曾传播到明治日本,但甲午战争之后,因国内局势变化,中国转而通过日本接受西学,这使很多人都低估了这段科学发展史。

作者避开了描述现代科学兴起过程时常有的“欧洲中心论”,把明清时期的中国科学问题从知识史的幕后搬到了前台,把耶稣会士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作新教传教士媒介作用的前奏,使1600—1900年的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该书分析了西学进入中国所经历的传入、调和与融合三个阶段,详细记述了甲午战后被人们淡忘了的中国现代科学的兴衰变迁,尤其注重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自主作用,即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现代科学。

(艾尔曼《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中译本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

● 包弼德 (Peter K. Bol)《历史中的新儒学》

新儒学 (Neo-Confucianism, 即“理学”) 在十二至十七世纪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理解世界、回应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叙述中国历史时,应赋予它怎样的定位?

在这本书中,作者考察了宋、元、明三代新儒家与士人精英、地方社会以及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对于新儒家在中国中古时期所扮演角色的一种全面考察。作者认为,新儒家将其学术思想应用到了地方社

会的实践中,倡导在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下由士人来管理地方社会,并不断地为这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寻找理论依据。逐渐地,国家认可了地方精英的领导,并把这视为巩固自身政权的必需手段。

十七世纪,新儒学丧失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而先前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却延续下来。那么,新儒学是如何使得这一秩序的确立和延续成为可能,就是该书要讨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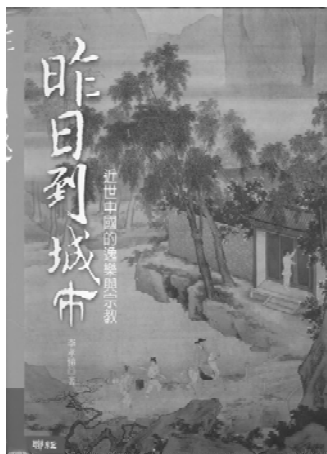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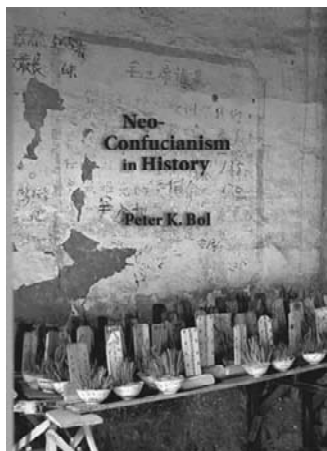
(包弼德《历史中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

以往学界论及士大夫文化时,时常囿于“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感时忧国”的大论述,而该书则从“逸乐”这类被忽略的“生活中的细微末节”来考察士大夫文化,通过人物身份的不同转换、精神世界内的世俗意识以及观看

城市的不同视角,呈现了士大夫生活的私密领域、宗教体验和逸乐精神,重构了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圆形”人物形象。

同时,作者使用大量情歌、戏曲和图像材料,描绘了近世中国社会的情欲世界图景,将传统观念中“严肃、禁欲的上层”的贯有表述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于礼教世界之外重新审视了当时中国的文化与





社会。

本书部分章节曾以《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为名于2002、2007年分别在台北和上海出版，此次进行了部分修订并作新序一篇。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9月出版。）

• 高桥智《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之研究》

日本室町时代，在东瀛的部分学者看来可以称为儒学史上的昏暗时期，因为相比于江户时代儒学的繁荣，那时的学术透明度非常低。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博士家经典讲读方法的秘不外传。当时博士家内部自传的儒学教材中，究竟隐藏着怎样非同一般的内容？封闭性的经典讲读，又是如何逐渐演变为开放的？该书从一个特殊的个案对这些问题作了专业性的解读。何晏撰写的《论语集解》是源流和价值评定最为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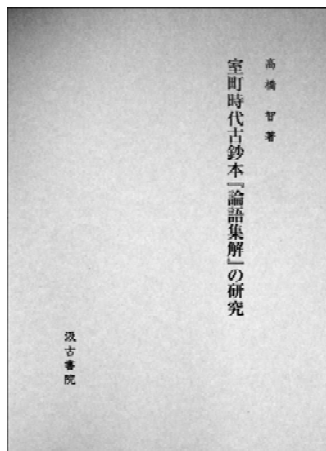
的室町时期经典之一，作者以此为焦点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和版本考定，从而使日本中世时期《论语》的接受以及日本中世儒学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得以彰显。

总的说来，本书对日本中世时期接受、传承《论语》的异常复杂

的情形作了线索颇为清晰的考述。在作为中世时期版本形态主流的写本研究方面，它也是1960年以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研究项目“日本现存汉籍古钞本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

（高桥智《室町时代古钞本〈论语集解〉之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8年9月出版。）□

王弘侠、杨琴、赵嗣胤、陈正宏等



外刊撷英

-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自我和他者”——相互作用的四种类型及其含义》(中日文化交流に見られる「自我と他者」——互相作用の四種の類型とその含意),黄俊杰,東アジア文化環流,2008年1月

中日自古以来便有着密切的文化和政治交流。两国的学者、商人、政客等在旅行过程中,切实地感受到对方的政治实态和文化价值与己方的冲突,从而在这种冲突中更强化了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近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在这种“自我”和“他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四种紧张的关系,即“政治的自我”和“文化的自我”、“文化的自我”和“文化的他者”、“政治的自我”和“政治的他者”、“文化的他者”和“政治的他者”四种类型。“自我”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并与它所处的政治文化背景相互作用,而与“自我”相对的“他者”,也会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在长期历史文化积淀基础之上的“自我”认识,往往要在同异国接触的过程中,通过对“他者”的观察才得以觉醒。近代日本许多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都是通过他们对中国这个“他者”的观察才觉醒的。基于“自我”要在与“他者”的接触中才显示出其主体性这一事实,那么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如何抑制“自我”的过度膨胀,即如何避免压制别人而只强调自己的观点,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 《贸易和都市——宋代市舶司和明州》(貿易と都市——宋代市舶司と明州)山崎觉士,《东方学》,第一百十六辑,2008年

在中国大约两千年的专制国家历史上,国家认识到海上贸易的重要性而将市舶司制度作为国家承认的官制和法律,肇始于宋代。市舶司的贸易管理功能主要在沿海港口城市实施,贸易管理业务促使原来的行政都市向贸易都市的方向转变。例如设有市舶务的明州,在南宋后期为了区别贸易管理中各种不同的业务,在城外进行检查、课税和先行的买卖,而在城内交付公凭等文书。为了防止不法贸易的发生,将城中“真空”化,彻底切断进入城中的海商与民间及无关官员的联系。这是在原有的行政都市的基础上加上贸易功能从而导致贸易都市诞生的一个例子。对城外亦施加很强的行政控制力,这正是中国贸易都市的特征。宋代时,从都市空间的角度而言,市舶行政与州的行政的执行是被隔开的。而到了将朝贡贸易作为国策的明代,市舶司的文书行政也在作为州行政中心的子城进行,这是贸易业务彻底渗透到都市中的反映。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以及国家对贸易管理的强化,都市空间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 《明代中期华北民间宗教的形成》(明代中期華北における民間宗教の形成)浅井纪,《东方宗教》,第110号,2007年

明代后半叶民间宗教结社的勃兴中,罗教即无为



教的形成,特别是正德四年作为罗教经典的五部六册的宝卷的刊行,对后世民间宗教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明代中期除了罗教之外,还有悟明教、净空教以及南无教等,通过对它们各自的经典《悟明宝卷》、《天华宝卷》以及《扫心宝卷》的内容进行分析可知,这三种民间宗教均与罗教有不同的教义。而这三部宝卷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家乡天上世界的神佛降临世间来救济终生,而无生父母信仰中救济的最高神——无生父母、无生老母信仰的形成可能与罗教无关。但罗教和此三教的教义均被明末的无为金丹道和大乘圆顿道所继承,这种继承反映了华北民间宗教形成过程的一个侧面。

- 《明代朝鲜人向辽东的移住》(明代における朝鮮人の遼東移入) 朴彦,《東洋史研究》,第六十七卷第一号,2008 年

朝鲜半岛的高丽人自元代起便以投降者、流入者、战争捕获者等多种身份来到辽东定居,随着红巾军将蒙古人逐回蒙古高原进而占领辽东,辽东的高丽人一部分回国,另一部分则继续留在当地被编入明的卫所体制。朝鲜建国后,也陆续有一部分朝鲜人越过国境迁入辽东。在朝鲜战役之前,由于辽东地区的赋役轻于朝鲜,朝鲜人向辽东迁入的行为一直在持续。这些边境的住民实际上是根据明和朝鲜各自国内的形势,通过在两方间的迁移来选择更为容易的生活。但处于优位的明朝只是简单地要求朝鲜送还移住到朝鲜的移民,而朝鲜方面则将送还移民作为其对明朝事大政策的一个环节来加以执行,从而造成了朝鲜人单向地移入辽东这一现象。但这些朝鲜人移住辽东后,是如何在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中生活的,则是现行的研究尚未阐明的问題。

- 《清代戏剧鉴赏文本中的演员及其仰慕者》(Actors and Aficionados in Qing Dynasty Texts of Theatrical Connoisseurship) Andrea S. Goldm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8: no. 1, June 2008

本文重在分析被称为“花谱”的文学流派,这个作

家群体笔下记录的是,生活在清代北京、身穿异性服装的男性演员们的魅力和才能。可以看到,这些文本,蕴含着文人作品关于品味和荣耀的修辞手法,充斥着情色文学的浮浪调侃,散发着城市传记的丝丝乡愁。“花谱”的作家们真心赏识都市风月场所的表演者,擅长运用丰富的寓言故事,清晰明白地阐述他们对潜藏才能和无疵美德等问题的关注。通过创作“花谱”,作家们可以把自己标榜成真正的艺术鉴赏家,以此有别于戏院中腰缠万贯的赞助人,同时也能够改头换面,重新表明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渐褪色的身份名誉。如此一来,这些戏剧鉴赏文本又相应地描绘出演员及其仰慕者的众生相。

- 《另眼审视伪书〈楞严经〉》(Another Look at the Psedo-Suramgama sutra) James A. Ben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8: no. 1, June 2008

通行的《楞严经》影响广泛,不过当下需要换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它。尽管日本、中国和欧洲的学者们早已明确地判定,这部经书是十八世纪的中国佛教伪书,但是在非佛教的中国原始资料中,它的内容和类似经文却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发掘。该书有些地方与其他关于禅宗的伪经如《金刚三昧经》、《圆觉经》等有联系,本文对此作出注解。不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把《楞严经》的思想追溯到唐代世俗文学的名著中去。《楞严经》中的部分章节,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人而非印度人思想的影响,即关于特定自然现象、动物和鬼怪等方面。本文认为,《楞严经》是一次深奥而又微妙的尝试,它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混合型宇宙哲学,这些内容将引起中国僧院精英阶层和世俗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

- 《“宋”王朝的遗产:从韩林儿到明朝朱元璋的国号与合法性》(The “Song” Dynasty Legacy: Symbolism and Legitimation from Han Liner to Zhu Yuanzhang of the Ming Dynasty) Hok-Lam Ch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8: no. 1, June 2008

本文考察各种反元势力所使用的合法性国号。韩



林儿和徐寿辉都是白莲教的首领,两人共同反元,又互相争斗,他们都建号为“宋”(960—1276)、居火德,以此使各自的政权合法化。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踌躇满志的朱元璋,在韩氏政权麾下效力时也赞成以“宋”为国号,然而,当他创建自己的王朝之时,却以“明”为号、居火德,这一国号的渊源可追溯至佛教净土宗。随后,为维护这种新的合法正统性,在《元史》中,朱元璋抹煞他本人以前辅佐韩林儿的事迹,并掩盖徐寿辉的“宋”国。可以肯定,对前明时期历史的篡改,误导了现代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反元变乱和明朝国号来源于摩尼教教义的启示。

- 《〈淮南子〉中的动物和动物隐喻》(Animals and Animal Metaphors in Huainanzi) John S. Major,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XXI, part I, 2008

《淮南子》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著述为世人所熟知,它通过直引、释义和暗指等方法,利用了来源范围甚广的各种资料,包括公认的文献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吕氏春秋》、《易经》和《诗经》等,而且极有可能参考了某些在汉代犹存,但如今业已亡佚或仍未可知的著作。刘安及宫中学者们努力使其成为有关这个世界重要信息的文摘,同时也是实现有效治理理论的引子,而非一部烙有那个时代烙印的哲学

政治理论倾向的书籍。在这些充满修辞色彩的手法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隐喻。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某些事物,它们成为隐喻手法的参照品,通常是关于人的行为举止,包括音乐、艺术家的技能或“诀窍”、工具、各类动物的特征和习性、骑马术和驾车术。研究《淮南子》中的动物隐喻手法,可以获得一条观察诸多问题的途径:汉代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配动物世界?他们熟悉的动物种类有多少?他们怎样考虑这些动物?如果说《淮南子》是西汉初中期上层知识群体的一篇文摘,那么,它也会成为我们了解这些问题的一把钥匙。

更重要的是,有关早期中国人对于动物的知识和态度的课题,至今仍未有出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淮南子》就成了观察动物天地的参考资料。书中不少章节提到各类动物,包罗万象,涵盖范围从螃蟹、软体动物到多种哺乳动物,食肉类种群尤为详尽。在《淮南子》这样一本篇幅有限的文献中,有太多的知识点无法全面展开。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书中涉及的大量典型样例,那么毫无疑问,《淮南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时人们关于动物本能和习性的系列研究报告。□

朱莉丽 摘

从《善邻国宝记》看日本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对华观

 朱莉丽

日本的五山十刹制度是仿照中国南宋的官寺制度而建立,五山禅僧则泛指隶属于五山十刹寺院下的僧人,以临济宗的禅僧为主。自足利氏开创室町幕府之后,一方面由于武士将禅宗视作培养武士品行和修养的一种手段,致使禅宗在日本地位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幕府有意培养服务于自己的知识群体,于是汉学水平与公家学者不相上下,而又易于被幕府掌控的禅僧们便充当了幕府幕僚的角色。

15 世纪初至 16 世纪中叶的中日间政府关系,基本是在所谓“勘合贸易”的框架下展开的,这种贸易形式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日方必须服从明王朝所规定的朝贡制度,日本统治者必须承认自己作为明朝皇帝臣属的地位,呈上称臣的国书,才能获得与明朝贸易的资格。为了保证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室町幕府的历任将军基本都选择了向明朝称臣的道路,以获得与明朝贸易的机会。

而对于执权者这种有损国家尊严的做法,对日本的国体持有强烈自豪感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认同。负责撰写对明国书的五山禅僧,虽然在文化上十分尊重中国,并继续从中国学习儒学、佛学,以及医药艺术方面的知识,但是在政治上,始终坚持日本与中国平等的立场。《善邻国宝记》收录了日明交涉过程中日本方

面呈递给中国的国书,它们的撰写者多是与幕府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居于五山世界顶层的僧人。虽然在国书中无法避免对明朝称臣,但他们却通过对词汇和文法的婉转运用来暗示日本与中国平等的关系。此书的编者瑞溪周凤在按语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表面看来对明朝毕恭毕敬的国书中,其实暗含了日本知识分子宣扬日本国体,强调日本与中国平等地位的决心。

应该说,这种意识是圣德太子开启对中国平等外交的先河后便一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传承的东西。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简略地归结为“慕华但不事大”。他们对中国只有文化上的仰慕,而没有政治上的从属主义。这是他们的对华观有别于朝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神国思想在日本兴起后,成为了日本知识分子对抗中国统治者所标榜的华夷思想的一个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使得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关系中更具自己的立场。到丰臣秀吉的时代,这种思想上的对峙终于演化为政治上的对抗和军事上的挑战,于是催发了那场牵动整个东亚的壬辰战争。□

朱莉丽为我院博士后人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08.10—2008.12)

- 2008年10月5日

《文汇报》刊登我院葛兆光教授的访谈(盛韵记录)《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

- 2008年10月6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应邀访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作题为《套印之意义再考——关于双色印本〈芥舟学画编〉书版》的学术演讲。

- 2008年10月9日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开始举办,第一次由葛兆光教授作题为《国家与历史——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与天皇制度的争论说起》的学术报告。

- 2008年10月11—14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联合国泛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蓬莱市政府、鲁东大学联合主办的“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毕拱辰及其译校的汉文西书》。

- 2008年10月14日

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教授颜海平来

访,并与葛兆光教授商讨双方交流事宜。

- 2008年10月16日

四川大学教授、我院访问学者王东杰作题为《声入心通:切音字运动与清季思想界塑造国民的努力》的学术报告,此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之二。

- 2008年10月16—18日

陈正宏教授应邀赴日本冲绳调查琉球本汉籍。

- 2008年10月16—19日

邹振环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西方人与清代宫廷”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光绪皇帝的英语学习与进入清末的英语读本》。

- 2008年10月18—19日

我院召开了《研究生入门手册》编者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借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一书的出版,对手册的编写体例等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会议由葛兆光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携相关编辑参加会议,并就各编者提出的



一些出版、编辑问题作出解答,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方晶刚和研究生院王永珍老师也参加了会议。

• 2008 年 10 月 21 日

我院助理研究员董少新在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历史所作题为《〈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文献与中国耶稣会史》的演讲。

• 2008 年 10 月 25—26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徐洪兴教授出席“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题为《朱子论周、邵〈易〉学》的论文并作报告。

• 2008 年 10 月 25—27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出席安徽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当选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 2008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朱熹研究在美国:以陈荣捷、余英时与田浩的研究为中心》的演讲,我院双聘研究员、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主持。

• 2008 年 10 月 28 日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李钟振教授来访。

• 2008 年 10 月 30 日

我院组织第六次博士后论坛,由李慧玲博士作题为《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辨析》的报告。

• 2008 年 10 月 31 日

陈正宏教授应邀担任日本庆应大学文学部“极东证券寄附讲座·古文献的世界”主讲人,作题为《安南本入门》的学术演讲。

• 2008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陈尚君教授出席台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试论〈全唐诗〉、〈全唐文〉校补的成绩与缺失》。

• 2008 年 11 月 6 日

我院新引进的副研究员许全胜正式开始了在本院的研究工作。

当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我院访问学者孙英刚在作题为《见鬼人与返魂香:中古巫觋文化的一个社会史考察》的报告,此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之三。

• 2008 年 11 月 7—10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陈引驰教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庄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循性而动”:六朝文士与庄学的一个侧面》的学术报告。

• 2008 年 11 月 8—9 日

邹振环教授、许全胜副研究员参加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新闻出版局出版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提交论文《中西文化之树在菲律宾移植所开出的奇葩——菲律宾印刷始祖龚容与高母羡的〈无极天主教真传实录〉》和《〈西游录〉与〈黑鞑事略〉的版本与研究——兼论中日典籍交流及新见沈曾植笺注本》。

• 2008 年 11 月 9 日

葛兆光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亚洲文化论坛(亚洲的价值观)”上作题为《如何通过亚洲认识中国》的主题讲演。

• 2008 年 11 月 12 日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学方法》的讲演,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教授主持。



• 2008 年 11 月 13 日

北京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的讲演,葛兆光教授主持。

• 2008 年 11 月 16 日

陈正宏教授应日本明清文人研究会之邀,在东京昌平坂学问所旧址作题为《近年来中国的明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演讲。

• 2008 年 11 月 22—23 日

徐洪兴教授出席第四届南北哲学论坛“政治哲学:从中国文化的视野看”学术研讨会,提交题为《宋代经学中的“尊王”思想——以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为例》的论文并作报告。

• 2008 年 11 月 24 日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彭刚来访,并为我院与历史系作题为《历史、历史解释、历史文本:通向常识视野下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学术报告。

• 2008 年 11 月 25 日

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签订合作协议。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参加签约仪式的有院长林茨泽教授、副院长宫岛博史教授及陈在教、金庆浩、吴炳守教授一行五人,我方代表有院长葛兆光教授、常务副院长汪涌豪教授以及学术委员会委员周振鹤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方晶刚也参加了仪式。签约仪式之后,双方就具体合作事宜及操作办法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 2008 年 11 月 26 日

我院派往台湾清华大学的助理研究员董少新结束一年的研修返院。

• 2008 年 11 月 27 日

我院邀请浙江大学黄时鉴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芮传明教授、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教授、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徐文堪教授等参加小型座谈会,共议中外交流史学科发展。我院葛兆光院长、许全胜、董少新、王鑫磊等研究人员,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文科科研处处长方晶刚也参加了会议。

当日下午,我院组织第七次博士后论坛,由王红霞博士作题为《读〈鸦片政权〉》的报告,另组织学术委员会在沪委员审查应聘者情况。

• 2008 年 11 月 27—30 日

陈引驰教授赴浙江师范大学参加“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和观念》的会议报告。

• 2008 年 11 月 28—30 日

邹振环教授参加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西学凡〉与〈童幼教育·西学〉:西方学科知识的传入》。

• 2008 年 11 月底

我院与哈佛大学东亚系合办,将于 2009 年 3 月召开的“都市繁华:1500 年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会议共确定 33 名海内外知名学者参加,邀请阶段的工作基本完成。

• 2008 年 12 月 5 日

我院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在日本明治大学“文化传承学”学术研讨会,作题为《册封、羁縻と朝贡》的报告。

• 2008 年 12 月 5—11 日

我院常务副院长汪涌豪教授和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及复旦大学出版社韩结根编审第二次赴越南检校“越南汉文燕行文献”的复制件。

• 2008 年 12 月 6 日

我院组织项目负责人会议并进行了部分项目的中期检查,葛兆光院长主持会议并督促各项目负责人按



照进度开展项目研究。此次共 11 个项目参加了中期检查并提交中期成果,经过专家组评审,均通过了中期检查。此外,有两个项目因负责人工作调动或身体原因提出延期,也获得批准,另有两个项目拟申请提前结项,另行安排专家评审。

• 2008 年 12 月 8 日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陈庆浩研究员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汉文文化整体研究:回顾与前瞻》的讲演,陈尚君教授主持。

• 2008 年 12 月 12 日

陈尚君教授赴北京国家图书馆参加《文献》杂志编委会会议。

• 2008 年 12 月 17 日

我院《东亚汉籍版本学辞典》项目组在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召开“东亚汉籍版本学专题研讨会”,辞典日方主编高桥智教授主持会议,中方主编陈正宏教授介绍了项目进展。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茨城大学、国文学资料馆、越南汉喃研究院,以及中国中山大学的有关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就辞典尤其是与越南本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 2008 年 12 月 17—19 日

我院葛兆光教授、邹振环教授及许全胜、董少新等研究人员应邀参加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的“跨越空间的文化——16 至 19 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国际学术研讨会。葛兆光教授在会议上作题为《十九世纪初朝鲜、日本与中国应对西洋宗教的策略——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的主题报告,邹振环教授提交了题为《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艾儒略与〈职方外纪〉》的会议论文,董少新提交了题为《崇祯年间援华葡兵新考》的会议论文。

• 2008 年 12 月 21—29 日

葛兆光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访问。在

京都,拜访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与人文科学研究所,看望了我院国际评鉴委员夫马进教授、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池田秀三教授等,与文学部平田昌司教授、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文京教授讨论了进一步交流的设想,并看望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前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兴膳宏,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所长吉川忠夫。

在东京期间,12 月 25 日,葛兆光教授在东京大学作《从文化、学术到思想——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界转变的一个侧面》的演讲,并与日本思想史学者进行了座谈。演讲会由东京大学末本文美士教授主持,参加者有东京大学前副校长、法学部部长渡边浩,文学部尾崎文昭、丘山新、横手裕、川原秀城教授,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教授,驹泽大学石井修道、小川隆教授,及来自目黑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日本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武藏大学的学者和岩波书店编辑部小岛浩等。12 月 26 日,葛兆光教授代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关本照夫、候任所长羽田正及丘山新、尾崎文昭教授进行了洽谈,讨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各种计划。

• 2008 年 12 月 25 日

韩昇教授在日本广岛大学作题为《長安への道》的讲演。

当日,我院组织第八次博士后论坛,由姚建根博士作题为《永远的成吉思汗——读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有感》的报告。

• 2008 年 12 月

葛兆光教授《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韩文译本由李妍承翻译,在韩国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月底,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来复旦大学进行为期两周的讲学。□



文史研究院“复旦文史丛刊”第一种董少新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二种皮庆生著《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我院资料室新购进《燕行录全集》全 100 册，林基中编，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出版。



日本神户大学釜谷武志教授向我院资料室赠送该校中文研究会年刊《未名》，第三号（1983 年）至二十五号（2007 年）。



封面题字 秦绍德

编 辑 杨 琴 肖 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 21 55665284
邮 箱 wsyjj@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